

往事如昨

# 邮寄花生米

丛素宁

花生米是我童年最奢侈的零食。每到冬天，家家户户都会从生产队领到几大麻袋花生，这是生产队分的任务：把花生壳去掉，把剥好的花生米送回去。多少花生能出多少米那是经过“科学”测算的，少了一两都不行。一旦少了，村民们甚至会怀疑这家人的人品有问题。

日子再穷，在品德方面可容不得一点马虎，村民们都尽职尽责地完成这项任务。白天，他们要忙地里的活，还要照料一大群鸡鸭和牲畜，根本没有一点点时间。晚上，每家每户都挑灯夜战，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男女老少总动员，齐心协力剥花生。实在困了，有办法：舀一瓢凉水，一家人轮流把头扎在里面喝上几口，或者去地窖里拿上几个萝卜分着吃。一口下去，凉滋滋的、辣乎乎的，一下子就能让大脑清醒。如果家里有会讲故事的，再讲一段鬼神的故事，那更是睡意全无。不知不觉，就剥出来一筐箩粉嘟嘟的花生米。现在想来，生产队并没有规定具体上缴时间，但大家几乎约定俗成，各家各户都能很快排着队把这些花生米送往生产队。

在大队门口，与领东西不同的是，队伍静悄悄的，大家心里都有些紧张，因为过完秤了，紧接着会计就能算出你家剥的花生米是“挣了”还是“折了”。多了的当场就可以带回家，“折了”的，齐刷刷的眼光就会投向你，那里面充满了鄙视和不屑，直刺心灵，让你在大冬天都能出汗。

生产队的计算方式是很人性化的，一般都会让出一斤两斤，因此一般不会出现斤数不够的情况。可是在当年，大家的肚子都是半空的，那花生米嚼在嘴里实在太香了，那种诱惑会让你不知不觉把它送到嘴边，当反应过来时，花生米已经不成型了，只能咽下去了。

我家送的花生米一般只多出一点点，因为当我们姊妹下意识送进嘴里时，母亲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她知道孩子们都在长身体，她太希望我们能吃上一口了，她也知道我们都自觉，绝不会再拿第二个。

花生米是如此珍贵，以至于我至今怀念放学后抓上一把放在口袋，和伙伴边玩要边吃上几粒的幸福日子。然而，更让我怀念的却是邮寄花生米，如果说吃起来还有些随意，那邮寄就很有仪式感了。

我家在乳山的一个小山村，我三叔在青岛当兵，现在想来这是多近的地方啊，但那时似乎就是遥远的天涯。三叔当义务兵的那两年是不能回家的，在那个通信不发达的年代，很少能知道他的信息。为了表达对亲人的思念，每年给三叔邮寄花生米，就是我们家最隆重的“外事活动”了。

邮寄的时间一般都是由爸爸妈妈商量出来的。这一天，他们会推掉所有的事情专门来做这件大事。

先是由母亲从供销社扯来二尺白细布，这白细布的尺寸也是经过精准计算的，少了不够，多了又浪费布票。买回来后，妈妈一针一线把布缝成一个口袋，然后爸爸妈妈一起合作，一人撑着口袋，一人往里装花生米。这些花生米是经过精心挑选的，小的、颗粒不饱满的筛选出去。有时候，他们装着装着发现哪粒不好，会当场拿出来。他们觉得装得差不多了，就用借来的秤称重，每年都是雷打不动的一公斤。他们经常是往里装几粒，再拿出几粒，再装进去几粒，这样颠来倒去以便准确称重，少一粒觉得不合算，因为付出的邮费一样多；多了又怕招来麻烦。在邮局，一旦重量超了，你要当场把多余的拿出来，那就得拆掉缝的好好的针脚，重新再缝。

封口的针线是早已准备好的，针脚要相当讲究，因为封口的针脚是裸露在外边的，一定要用白线，且要确保每一针的长度都一样。当妈妈用她那万能的牙齿咬断线头时，表示封口的工作已经圆满完成。这个时候，又是爸爸出场的时候，妈妈给他递来事先研好的墨汁和不知道从哪里找来的细毛笔，爸爸开始书写邮寄地址。这个地址尽管爸爸早已烂熟在心，但他还要把三叔的书信郑重地拿过来，照着上面一笔一画地书写。

每每这个时候，我们姊妹三个总是凑过头来，妈妈则一遍遍紧张地驱赶：“远点，远点，别碰着你爸爸。”这书写是不允许出一点点差错的，如果错了，就意味着要重新买布，那工程就大了，还浪费。这个时候，爸爸会屏住呼吸，全神贯注，去完成在鼓鼓囊囊、凹凸不平的花生米袋子上写字这个极大的挑战。他每次都要用很长的时间，看得我们都非常着急，而妈妈却总能耐心地陪伴左右，待爸爸写完最后一笔，总能看到他们会心的微笑。

一切就绪，爸爸便小心翼翼地带着这袋花生米，向离家几公里的公社驻地出发。爸爸说，最紧张的是看邮递员称重，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邮局那个有点掉漆的绿色磅秤，就怕返工，他可缝不出妈妈那像工艺品一样的针脚。

花生米寄出后就是漫长的等待，直到有一天，收到一封信。虽然“寄来的花生米已收到，勿念！”之后，甚至没有一句感激的客套话，却总能让全家人欢呼雀跃，热泪盈眶。

邮寄花生米不仅能表达对远方亲人的思念，还意味着一个家庭里有个“在外工作”的成员，这是那个年代很值得自豪的事情。可见，邮寄花生米曾是一件多么让人羡慕的事情啊！

## 老照片里的故事

尹爱群

打扫卫生时翻出一个紫檀木匣。木匣是个老物件儿，匣盖上用浮雕技法雕有喜鹊登梅的图案。打开木匣，一沓黑白照片映入眼帘。这些照片，如一帧帧电影蒙太奇，打开了我尘封已久的记忆。

小时候，每当家里来了客人，为安抚不安分的我和弟弟，老妈便会拿出这个平时不准我们触碰的木匣，倒出里面的照片，任由我和弟弟翻看。心情好时，她甚至还会借机向客人讲述这些照片背后的故事……

一张小娃娃手捧气球的照片，我和弟弟都很喜欢。我认为这是我，弟弟偏说是他，他甚至还理直气壮地指着说：“你看你看，你的头发是长的，而这张照片上小娃娃留着短发，怎么能是你呢？”我据理力争：“那时我的头发还没长长呀！”我俩各执照片的一边互不相让，都想据为己有，扯来扯去，只听“嗤”的一声，照片被撕成两半。望着自己手中的半张照片，又望望彼此，我们的争吵戛然而止，自知惹祸、面面相觑、不知所措。老妈一边怒斥“姐没姐样、弟没弟样”，一边找来胶水和纸，小心翼翼地把照片拼接起来。

老妈告诉阿姨说，那是我的“百岁照”。老妈还告诉阿姨，我的出生纯属意外。

原来，老妈和老爸结婚五六年一直没“动静”，在烟台、济南看了很多医生都没啥效果。老妈当时已转业到烟台医药公司工作。五十年前，烟台医药公司位于现在的朝阳街中段，距离烟台山医院很近，经烟台山医院熟悉的医生介绍，老爸老妈到上海的大医院求医问药。

长途跋涉地到了上海，经过一番折腾，医生诊断的结果是老妈患有先天不孕症。这一消息如同晴天霹雳，打击得老妈直接病倒在招待所里，水米不进，一吃东西就吐。看老妈痛不欲生的样子，老爸安慰老妈：“有的伟人还没有孩子呢！咱们可以更安心地、更省心地工作、生活和学习了！塞翁失马，安知非福？”老爸尽管有些言不由衷，但多少也慰藉了老妈心中的酸楚和不安！

回到烟台后，老妈依然食欲不振，不间断地呕吐。西厢房奶奶看到老妈萎靡的神态，说：“你该不是怀孕了吧？”老妈断然否认，说：“怎么可能？上海医生已经说我患有先天不孕症了。不抱这个希望了！”

过了两周，老妈渐渐出怀，到医院一检查，还真是怀孕了。大医院的医生用他的专业跟老爸老妈开了个玩笑！可老妈不肯否定上海医生的水

平，偏说我的出生是一个美丽的意外！

老妈说，她怀我七个月时，正是寒冬腊月，煤炉夜间需要封火。有天夜里，朦胧中自觉浑身乏力，潜意识告诉她是一氧化碳中毒了。母爱的力量是无穷的，老妈迷迷糊糊中努力挣扎着爬上窗台，用尽全身力气推开木窗，一头栽在窗户外。当清冷的寒风将她吹醒，她知道自己又活过来了。当然，同样活着的，还有她肚子里的我。老妈说，就差那一丢丢，这个世上就没有我了。

还有一张五六岁模样、梳着童花头的照片。老妈说，这是邻居小姐姐带我去所城里西面“锦章照相馆”照的。就是那位西厢房奶奶家的小姐姐。我蹒跚学步后，小姐姐就喜欢领着我一起玩。老妈告诉我，小姐姐经常带我去她家吃饭，带我去喝蚂蚁酒。

我立即脑补出这样的画面：两名梳着羊角辫的小女孩，头挨着头，蹲在所城里逼仄的青石板路或犄角旮旯里寻找个蚂蚁。找到后，便用手捏着蚂蚁的屁股吸吮着喝“酒”。现在想一想，那根本就不是什么酒，而是学名叫蚁酸的分泌物罢了！

朦胧的记忆中，小姐姐还曾带我偷过她奶奶的猪大油和蜂蜜。猪大油和蜂蜜那时可是难得的宝贝。为防小孩偷嘴，平时一般都会放在高高衣柜上面的篮子里或挂在屋梁上。

美味的力量是无穷的。为满足口腹之欲，小姐姐和我排除万难，搬来一个小木凳，我在下面负责扶稳，她小心翼翼地爬上木凳子取了篮子递给我。我接到篮子放在地上，再把她扶下来。打开篮子上蒙着的蓝花布的瞬间，我和小姐姐瞬间就被猪油给香迷糊了，被蜂蜜给甜迷糊了。尽管不敢取用太多，但猪油和蜂蜜抹在馒头片上那无与伦比的香甜气息，醉了我们的童年，令人难以忘怀！

后来，我们家搬到文化路，不得不和小姐姐分开。我不记得小姐姐的名字，只模糊记得，她是我的“小五姐姐”，那张照片便是小姐姐带我去照相馆拍的，说是留作纪念。可惜那个年代，一别竟成永远。

触摸着这些老照片，我心中无限柔软，忍不住泪眼婆娑。老照片无疑是人生的一束光，这束光总会在某些不经意的瞬间透过云隙洒在我们身上，勾引出我们对过去美好的追忆，那么纯粹，那么芳菲。

假如时光能够倒流，我好想回到过去：我还是那个无忧无虑的懵懂少女；爸爸妈妈依然风华正茂、激情如火；小五姐姐还是那个踮起脚尖偷食猪大油和蜂蜜的馋丫头……